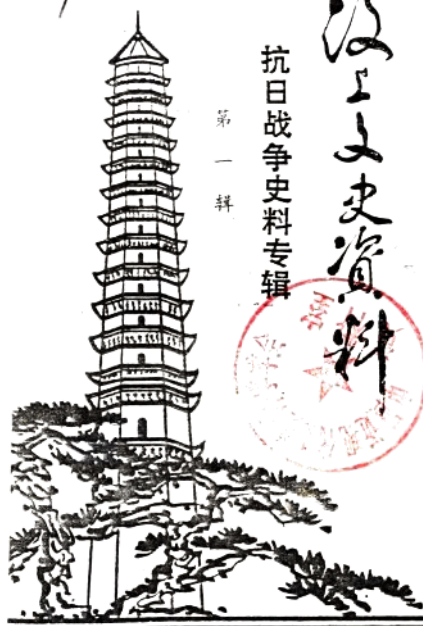


1508 (印(本))



抗日战争史料专辑

第一辑

抗日战争史料



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
胜利四十周年

前 言

在县党政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我们征集了有关汶上县军民抗日斗争的部分史料，汇编成辑，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本辑收录了汶上县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起的“永安寺起义”；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白育普‘破产’抗日”；浴血奋战十一昼夜，击垮日伪军五县合击“围剿”的“汶南战役”；速战速决使日伪军闻风丧胆的“胡楼战斗”；以及出其不意，智俘伪军四十余人的“草桥‘阅兵’”和日军残无人道“血洗汶上城”等史料。这些史料仅是汶上军民在八年抗战中的几个斗争片段，然而，它却反映了我汶上军民在抗日斗争中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本专辑出刊，是对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杀敌，壮烈牺牲的革命先烈的缅怀；是对当年亲临战场而今健在者的抚慰；同时也提供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教材。它将启

迪我们热爱乡土，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从而更好地为实现“四化”贡献力量。

本辑在编写过程中，承蒙有关部门和部分老同志的大力协助，在此谨向为我们提供史料的部门及撰写稿件的同志表示诚挚的感谢。

编辑史料是一项细致、严肃而复杂的工作。由于我们编辑水平所限，时间仓促，错讹、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政协汶上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五日

目 录

忆汶上县永安寺起义·····	刘定 (1)
白育营“破产”抗日·····	周振华 (30)
草桥“阅兵” ·····中共汶上县委党史征委会	(39)
附：康子召同志的来信·····	(45)
汶南战役始末·····	杨涛 (50)
胡楼战斗·····	冯维功 (67)
日寇血洗汶上城·····	李继运 (75)
记日寇监狱中的暴行·····	贾志广 (78)
抗日三字经·····	冯玉祥 著 (83)
童 谣·····	唐维一 (89)

忆汶上县永安寺起义

刘 起

汶上永安寺起义，是汶上县各区和东平西部田大店、唐楼一带的知识青年联合农民共同组织拉起来的一支抗日队伍。

这支抗日武装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先由中共鲁西南特委派来刘星同志为党代表，继又得到东平地下党的关照支持和大力帮助。据东平田骏夫同志说，一九三八年春末夏初，永安寺起义部队移驻汶上城北时，东平县政训处的万里同志曾派杜子俭同志和他同去参加，因部队转移，未能找到。

这支起义部队，从开始秘密组织到举起抗日大旗，时间较早，对唤醒当地人民快快起来抗日，有一定的促进和影响。

一、起义前的社会背景与动机

永安寺起义的参加者，是在日寇压境，恐日病到处流行，国民党反动当局，媚日求和，不准抗日的历史条件下，抛开温暖的家庭奔赴寒冷荒凉的永安寺大庙，铺草睡觉，募食吃饭

的困境中集合，举起抗日大旗的。在对日寇侵略这一生死存亡的问题上，当时中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三种人：①投敌卖国，认贼做父，当汉奸升官发财；②爱国有心但畏难怕死，活命第一，俯首当顺民；③爱国不怕死，联合起来打日本。这第三种人，才是我国救亡图存的中流砥柱。

永安寺起义的参加者，特别是其中的骨干分子的抗日爱国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他们从高小起就参加了反对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的学生运动，日本侵占济南的“五三”惨案当时在济南上学的，更是身受其害。

“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强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日寇，尤其令人发指。此后，“何梅协定”，又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主权让给日本。日寇侵略野心难饱，得寸进尺，国民党屈辱畏怯更甚，一让再让，引诱得日寇又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和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等。当时亡国灭种的危机已迫在眉睫。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激起了北平学生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当时在北平和济南上学的后在永安寺起义的组织者中有些人是亲自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

动的。从以上这些亲身参加反对和亲眼看到的日本侵略我国的事实，很清楚地在脑子里得出两大结论：①日寇侵略亡我的野心不死，我国处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②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统治集团是不抗日的，高喊“攘外必先安内”，倾注全力打内战，屠杀抗日军民。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怎不叫人对日对蒋极端愤恨呢！

由于上述原因，永安寺起义的组织者中的陈伯衡、曹志尚、曹整周、刘启文四人，虽都先后参加过国民党，但在思想上组织上早与该党断了关系。陈伯衡自一九二九年暑假回济南一师复学后，每次回家常向我们谈论：三民主义不彻底，不能救中国，蒋介石法西斯专政不民主等。他一师毕业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常和共产党接触，受影响较大，寒暑假回来，就向我们解说共产党和苏区的情况，并以苏区劳动人民得解放群众利益有保障和蒋统区的人民受苦受难受压迫相对比。听后，令人兴奋羡慕，觉得中国有前途。陈的年龄比我们小，按岁数我们是老大哥，但因陈学识渊博见闻广，公正无私品德高，在县里自然而然的成为我们都很尊重的领头人。

由于陈伯衡的宣传影响，我们很亲近共产党，曾从陈的北大同学中共地下党员杨启哲的竹子书箱内偷拿出几本党的书籍，有铅印的有油印的，都是列宁的文章。另有一本铅印的，封皮上的大字是“孙中山著建国大纲”，里边印的都是党中央的决议，有“反对李立三路线”，觉得名词新鲜，故印象较深。又觉得这些决议秘密性强，未敢拿出，拿出来的书，带到国民党县党部（实际只是个区分部）中院西楼县农民协会内偷着看。在当时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党部内看共产党的书籍，说起来是奇谈怪论。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由此可见这几个所谓国民党员的思想倾向了。

对日寇侵略灭亡我国的暴行，凡有国家观念民族意识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誓死抵抗到底，永安寺起义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就是为国为民而互相秘密联合起来的。既然决心抗日，就要跟着个真正抗日的组织一块走，才能有力量，不致孤立无援。事情明摆着，真正抗日的就是共产党。但我们有几个人是明贴着国民党的标签的，共产党对他们恶而远之，不屑接近。我们想靠共产党，他们又秘密隐蔽在地下，欲找无门，幸而陈伯衡和共产党早有交

情，才能请到共产党员刘星同志来领导这支武装，这支队伍得到党的领导，日益壮大，在其组成人员中，大都先后加入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在这上这块土地和人民中也有了共产党的组织，让我们为此庆幸地赞颂能找到共产党领导，功在伯衡，能建立起党的组织领导，功在刘星。

二、秘密酝酿筹备起义

当时的反动头子蒋介石是不允许抗日的，抗日有罪，最轻也是先抓起来。当时的农民都是自种或租种一小块土地，养家糊口，除年节婚丧赶集赶会外，很少来往。这种散沙般的个体农民，怎样才能把他们组织起来抗日呢？从历史上看，三国前夕，黄巾起义靠的是太平道组织。明代山东汶上田斌起义，靠的是白莲教组织，清朝洪秀全金田起义靠的是上帝会组织。这些历史上的起义都要有个什么组织的经验。但我们当时都不具备，依靠的只是亲朋友谊和已被取消的老农民协会的旧组织这些比较松散的关系，但也有个一致的目标，那就是：不满和厌恶当时国家社会的腐败落后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欺侮，要改革它，这一志同道合的共同革命理想，象磁石一样把我们吸引到一

块了。

先说亲友谊方面的情况，自北伐胜利以来，在汶上县里，由于反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斗争，形成了新旧两派。我们永安寺起义的组织者们，大都是所谓新派的人。这些人按参加时间先后的顺序是：陈伯衡、曹志尚、曹麟周、刘启文、郭鹤村、张云峰、路廉本（改名路唐克）、崔孝堂、王英如、侯唤民、王少原、王相三等。“七七”事变前后又结识了齐刚、隋长文、张寿椿（又名张璣）、解英、刘曰楼、陈兰春、杨敏、陈冠英、陈允梅、张良璧、陈皋鸿、陈允桐、曹修梅等一些年轻的学生。

另外，曹志尚和我曾考入济宁专区短小教员训练班，汶上县考入的学员约三十人上下。结业回来后曹在十区老僧堂当教员，其他同学分散在各区乡任教员，我留在县义务教育委员会工作（在县教科内办公），这一下在全县小学教员和教育界中，结识了好多朋友。我们就是在所认识的朋友中动员选找愿意抗日而家庭情况又能出来的人作为基点，再向周围发展扩大的。

再说老农民协会方面的情况：老农会在

一九三五年被国民党县党部逼着撤销以前，就被取消禁止活动。但农民协会自陈伯衡组织成立以来，我和曹志尚、曹麟周都在其中工作过，取消以前较长的时期内，在乡村成立的农民协会会员中，还是有些熟人可以联系的。进行访问、寻找愿意起来抗日的人，他们既可保密也可接受。实际这样做后，确也取得一定的效果。

依靠上述两方面的关系，找到坚定抗日有活动能力的人作基点，由点到面的向外扩展，既找能出来抗日的人，又找愿意拿出枪支弹药的人。在开始秘密组织时，除此以外，再无其它组织和办法。这样做的有效性，可用几件事实来说明：①马广义、陈兰春、张良璧、杨敏四家是联串的亲戚关系，先动员好陈兰春，陈又结合张、马、杨三人，记得他们四家至少拿出三支步枪，而张、杨还又另外扩大了人和枪。②王相三在四区乡农学校撤销前夕（县政府未逃前先撤销的各区乡农学校），经动员打气，他以乡长身份和朋友交情，软硬结合，叫该校杨校长交出两支匣枪和子弹，由刘星、伯衡各用一支。③在四区乡农学校校长交枪前，经过八区拳铺原农民协会负责人，取回该区乡农学

校校长借用的该村八音子手枪一支，由刘启文使用。④三区鹿庄桥杨姓，有湖北造步枪一支，杨家与双楼刘家是亲戚，经我去动员，他愿把枪拿出，但家中无人扛枪出来，即交由该村在力生合作社做采购工作的杨某带出来参加。⑤五区县山脚下，某庄老农民协会的一些人，由于我去动员过他们组织起来抗日，他们就自动拉起几十个人带着枪，在县政府逃跑后，日寇未侵占县城前，未和我们联系，自行闯进城内占领县城。当时刘星同志正住在城西周村陈伯衡家，闻讯急忙前去，劝他们撤出县城，回家等通知，进城后纪律很不好，影响不佳，记不清什么原因，永安寺起义时他们未去参加。因此从未把这一行动记入永安寺起义的队伍帐内。⑥通过曹麟周同志和汶上县警察队长吕士湘的朋友关系，曾与吕说好同意和我们一块抗日，但在吕率队随县政府逃走时，我们为隐蔽目标，不被国民党的后卫部队所发现，未敢出面叫他们拉出来另行活动。但这支武装在撤退路上，因想家心切，零零星星跑散了。

秘密组织联合情况，在伯衡未来汶上前，因怕邮信被检查互有影响，未敢写信告知，所以他事前没有思想准备。在他到汶前，我们活

动的方式是，只要有机会见面就互相商谈，碰上几个人就谈几个，只要有利于抗日的事和办法，商量好后就互相传说，根本没有开过什么正式的会议。因为抗日决心既已下定，工作任务很简单，就是联合人联合枪，用不着反复研究开会，会开多了倒容易暴露目标，那时商谈联系的地点，主要在力生合作社内，就连伯衡、刘星来汶后，商谈问题也主要在这里，在这里相会交谈，人来人往是司空见惯的老习惯，不会引起外人猜疑。

谈起力生合作社，确实对我们的抗日秘密活动起了不少的作用，凡是秘密商量问题，大都在那个地方。那末，成立力生合作社的宗旨是什么呢？经济政治两方面的意义都有，以经济保政治，也就是以做生意这个办法，达到第一争夺商会的领导权；第二作为我们这些所谓新派进步人物的联系地点。它是以集股办法筹集资金的。每股三十元，半股十五元。入股的大都是教育界的人士，如小学校长教员等，也有少数进步的靠近我们的乡镇长。他们入股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教育用品有保障，二是盈利可分红。

为什么叫“力生”，就是因为国民党取消

了我们所办的农会、教职员工会等组织，非常愤慨，才用的这个名字，意思是“自力更生”，不依赖邪恶势力继续干。早在一九三〇年，也用这样的办法成立了一个商社，地址在东城，名叫“鼎新商社”是革故鼎新的意思，那是针对地方上的旧势力要革他们的命而起的，后来因为汶上十个区，三、四、六、七、八、九、十各区都在县城西面，而各机关又多设在西门里，拐弯抹角到商社去联系，很不方便，后来便让郭鹤村他们几个人自己经营了。

一九三七年九月末十月初，陈伯衡随其学校（济南齐光中学）南撤来到汶上后，即在力生合作社内和我们见了面，向其汇报了秘密组织抗日游击队的情况后，他毅然决定，不再随校南下，留在县里共同组织抗日武装，随后又商谈武装一旦拉起来，不能独树一帜，孤立无援，被人吃掉，达不到抗日的目的，要结合什么力量，打什么旗号时，伯衡提出共产党抗日坚决，且善于打游击战争，要跟共产党走，大家欣然同意。又进一步研究如何去找共产党时，伯衡很有把握的说，请共产党他负全责。因当时有些机关团体，正在撤退转移，没有固定地址，查找个人颇不容易。记得约有一个月的时

间，才第二次请来刘星同志。刘到后，大家都很高兴，认为有了党的领导，很尊重他，重大问题都等他作最后的决定。那时党的组织活动是秘密的，但刘是我们请来的共产党，在我们这些人中是公开的，人所共知的。因此也传到外边去了。

记得刘星同志来时，天气尚不很冷，他只穿着制服和衬衣，拿着清华大学发的粗薄呢短大衣，一件白绒衣未穿，准备以后再冷时加添的。因为工作忙，直到很冷还未穿上棉衣，绒衣里生了很多虱子，烤火时脱下来一抖搂，虱子掉到火里烧炸，嘭啪乱响。那种艰苦奋斗的作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影响。拉起队伍后，大家都能不怕苦、刘星同志起了表率作用。

伯衡留下后，为了进一步督促和了解秘密组织抗日工作的情况，决定召开一次骨干分子会议。为避免暴露目标，征得王相三的同意，在距城十余里的战弯村王家的北场院内举行，到会人数近三十人（距城较远的未来）。会上除汇报能联合到的人和枪外，主要讨论了①我们应该有个组织名称去联合人；②日寇到来前后的情况和我们的对策。名称问题，大家提了

好几个，现只记得齐刚提的是“民主解放社”（这时他已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最后没有统一意见，未确定使用什么名称。对日寇打来的问题，因为谁都没有经历过，没有一点经验。估计猜想日寇袭来时，好象拉网似的，凡是敌对它的，必被拉出来拉走。我们是搞敌后游击战的，不能迎头打它，首当其冲。因此，应该是国民党未撤退前，不能暴露，日寇未过去前，不能暴露。这是会上大家公认的对策。因为我们要抗日到底，就不能在刚拉起来的幼苗时期被敌拔掉。

这次会议是在下午开的，在王家吃的晚饭。回城时天已黑了，碰上濛濛细雨，上衣被淋得潮湿。刘星同志是否参加，现已记忆模糊。是伯衡主持的会议。此后，有一天晚上，又在张云峰同志任校长的张场高小开了一次会。参加的人数，比上次少点，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互通情报，积极动员联合人和枪。记得刘星同志参加了。散会出来，月明星稀，自行车骑得很快，时间不久就到家了。

在汶上旧县政府撤退前后，刘星、伯衡曾去东平田大店、唐楼活动，因为这里距汶上六区齐岗村较近，当时在家住的齐刚（原名齐成